
审美·家国·想象：

由沪上咖啡馆到知识分子的“恋地情结”

胡星灿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20世纪20—30年代, 寓居上海的知识分子促进了沪上咖啡馆消费文化的勃兴。咖啡馆不仅是文艺创作的前背景(foreground), 甚至还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知识分子的审美现代性及家国认同感。将知识分子对上海咖啡馆的情感放置到人文地理学背景中去考量, 可知这场群体性文化现象的滥觞成因及深层意涵, 而且, 面对作为“地点”的咖啡馆, 知识分子从“在地”到“恋地”的心理路径也得以彰显。

【关键词】咖啡馆; 知识分子; 恋地情结; 消费文化

【中图分类号】L207. 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049—06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伴随着大量外侨(主要是俄国、日本和犹太侨胞)来沪发展, 沪上独立经营性的咖啡馆逐渐增多, 咖啡馆消费文化渐成风气。据上海海关贸易册显示, 仅1931年上海进口咖啡的数量就多达499374斤^{〔1〕}, 可见沪上饮咖啡的风气之盛。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股风潮中, 这一时期寓居上海的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频繁往来于咖啡馆, 这几乎成为一种日常仪式, 而且还基于自身的体验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重新定义和阐释了上海的咖啡馆。田汉、夏衍、阳翰笙曾在建国后数度回忆起上海咖啡馆, 认为上海的咖啡馆是“值得自豪”的存在^{〔2〕}。在他们的回忆中, 我们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在重塑上海咖啡馆意涵时所投射出的依恋(attachment)情感状态。潘桂成在分析地理感时提到过: “由识觉环境的感官(sensory organs)对环境产生价值意义(make sense), 都是实在的有地理学的意义”^{〔3〕}。借此, 我们不妨将知识分子对上海咖啡馆的情感放置到人文地理学的背景中去考量, 并借用段义孚有关“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概念来分析民国知识分子和上海咖啡馆之间的互动交往, 从而可知知识分子因对咖啡馆的“恋地”而生发出的对审美、家国的想象。

一、地方：沪上咖啡馆与寓沪知识分子

正如罗威廉(William Rowe)所说: “犹如伊斯兰和早期近代欧洲城市的咖啡馆, 人们去那里并不是寻求保持隐私, 而是享受无拘束的闲聊。”^{〔4〕} 建立于1686年的Le Procope咖啡馆, 在诞生初期只是一个供应咖啡和餐饮的处所, 然而随着时代更迭, Le Procope的文化和政治意涵日益浓重。从启蒙时代开始, 这座咖啡馆就曾接待过许多文化名人, 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拉封丹; 到大革命时期, 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雅各宾派领导人更是咖啡馆的常客, 还有大批作家如雨果、巴尔扎克、马拉美等人也常常出没于此^{〔5〕}。可见, 咖啡馆逐渐成为人们指涉严肃和文明的公共空间, 知识分子在其间“集体参与改进社会及人类文明”^{〔6〕}。

收稿日期: 2016-04. 16

作者简介: 胡星灿(1989—), 男, 浙江衢州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文化地理学、华文文学研究。E-mail: huxingcan1989@sina.com。

上海咖啡馆在建立之初，就隐射出它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厚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大量文艺界人士以咖啡馆为素材或主题进行过创作，如徐哥的《吉卜赛的诱惑》、林徽音的《花厅夫人》、温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张若谷的《咖啡座谈》、田汉的《咖啡馆的一夜》和孙了红的“侠盗罗平探案”系列等，“上海文学似乎整个地沉浸在‘咖啡馆’风潮里”（7）。不单是创作，文人似乎也将去咖啡馆变成一种日常习惯。正如李欧梵所说：“上海的作家把咖啡馆当作朋友聚会的场所却是无疑的。从当时记载和日后的回忆看来，这种法国惯例加上英国的下午茶风俗在当时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日常仪式。”（7）。

从1928年8月8日《申报·艺术界》刊登的一则广告便可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对咖啡馆的推崇：“……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哪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8）这个“理想的乐园”即是咖啡馆，当然这则广告很有可能是编者张若谷化名篡改事实而写的，因为不出五日，郁达夫和鲁迅便接连撰文澄清事实。郁达夫在《语丝》中发表《革命广告》说自己不去革命咖啡馆的，“宁可在茶馆里坐坐，能够听到许多社会的琐事和下层职业的情况”（9）；鲁迅更是说自己“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8）。然而有趣的是，即便鲁迅强调自己不去咖啡馆，但一年之后，他也迈进了“公啡”咖啡馆的大门，此后更是常常进出咖啡馆参与会晤交流等活动，如他和萧红、萧军、周扬、巴金、夏衍、魏猛克等人的交谈都是在“公啡”中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公啡”位于北四川路998号，咖啡馆对面就是内山书店，走不多远就是创造社、太阳社、左翼的总部，甚至离鲁迅、冯雪峰居住的拉摩斯公寓也没多远，因此“公啡”自然成为左翼人士、文艺界人士交换意见、沟通情感的场所。

可见知识分子出入咖啡馆已成为无可逆转的风气。不仅如此，更有极端的例子。曾留学法国的张若谷，不仅将咖啡馆当作“现代城市生活的点缀”，还当作一个“外人不足道也”的“逍遥”世界（10）。张若谷的一帮朋友，如朱应鹏、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曾朴、曾虚白等人，也是咖啡馆的常客，“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咖啡馆，一壁喝着浓厚香醇的咖啡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10）。张若谷不仅将自己往来于咖啡馆的经历视为美谈，而且更详细记录了他身在其中交流文学、艺术、国事的情境：“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为俄国人所设，这是我们在上海几家咖啡店中最爱坐的一家。我们一群，虽然都是自称为无产阶级，上海最贵族的Marcel与Fedra二家，倒也进去喝过咖啡。但是印象最好的，还是这座亚洲的‘巴尔干’半岛。记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彦长，田汉，朱应鹏与我，在那里坐过整个半天。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华沙咖啡……大家说说笑笑，从‘片莱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种问题上去”（10）。张若谷不仅将对咖啡馆的推崇落实在生活常习中，更落实于编辑和创作《申报》的过程中。比如，他就很推崇那些有着“咖啡癖”作家的作品，如莫莱亚(jeanmoreas)、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吕德(maximilien)、雷彦(henri de regnier)、乔治·莫尔(georgemore)等人的作品（10）。不仅如此，张若谷还在咖啡馆中践行他的情爱想象，比如在《俄商复兴馆》一文中，他就借穿“咖啡色西装的青年”之口，表达了这种想象：“他们一边慢吞吞的呷着浓厚香醇亚拉伯人发明的刺激液质；一边倾泻出各人心坎里积累着的甜蜜，彼此交换着快乐的印象，有时在灯红酒绿之下，对面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向他们细细地追述伊的已往的浪漫事迹；轻听一句二句从钢琴和提琴上发出来的旋律……”（11）张若谷这种“稍稍自恋的倾向和罗曼蒂克的气氛”（7）引起了诸多非议，史螳在《文艺咖啡》中就说，“多情敏感的新文艺作家”，因“上海咖啡”雇着女招待，“大家都想到这里来获得一些‘烟丝拨里纯’”（12）；鲁迅也在1936年讽刺“四条汉子”为“才子加流氓”（7）。

知识分子频繁进出咖啡馆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究竟是倚重咖啡馆的功能性和工具性，还是看重它背后的文化、空间意涵，已无从探讨，因个体经验、倚重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知识分子的定义下，咖啡馆的意义已然超越了它的物理属性。比如阳翰笙、田汉、夏衍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千方百计要回到上海寻找当年的咖啡馆，做一番精神巡游，对他们而言，咖啡馆已顺理成章地成为融合着经验、记忆和在地文化的“地方”。又如1944年，史蛰蟬在谈及现今上海咖啡馆时，也沧桑地哀叹昔日的“文艺咖啡”风光不再，寓沪知识分子散落天涯，咖啡馆成为永无回去可能的“地方”（12）。如是观之，知识分子和咖啡馆之间的相互定义，使得咖啡馆成为知识分子寄托某种情绪和理想的地方，遂产生出依恋该地的“恋地情结”。

二、恋地：由咖啡馆到知识分子的审美取向

段义孚在解释“恋地情结”时说过，人面对地方产生依恋情结的先决条件是对该地有相应的审美体验，“此种美感往往发生在突然面对一个前所未知的景致之时，正好与某个地方的后天之爱或亲密之感形成鲜明的对比”⁽¹³⁾。由此观之，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构建“恋地”的心理结构时，引起的审美反应是显著的。田汉在《咖啡馆之一夜》中就充分还原了其对“公啡”内部装饰的审美：“精致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饮器的厨子，中嵌大镜。稍前有柜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盘等，台左并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的右方通厨房及内室，障以布帘。……右方置一小圆桌，上置热带植物的盆栽……室中适当地方陈列菊花，瓦斯灯下黄白争艳。两壁上挂油画及广告画……”⁽¹⁴⁾田汉借咖啡馆陈设的描摹，呈现了一个颇具殖民风格的空间：大镜、暖罐、圆桌、热带植物暗示着具有南国风情的西式装饰风格；而菊花的陈列，则象征着东亚审美风格的引入。这种东西交汇、中外杂陈的装饰风格，对具有留日背景、推崇“新浪漫主义”的田汉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事实上，咖啡馆在迎合知识分子的审美特征时也做了些努力。比如知识分子常去的、位于霞飞路的DD'S咖啡馆，不仅在大门设计和建筑外观上采用西方建筑中典型的半圆拱形结构，而且内部有螺旋形的旋转楼梯，邻街还装有敞亮的长玻璃窗，其内部陈设除了基本的装饰外，还存放有具有强烈西式风格的油画、摆件、器皿等。此外，室内还有卫生间、电话等现代化设施。这对追求文艺感、现代感、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而言，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我们听南国社骨干吴作人、陈白尘、金焰等老前辈回忆，他们当时都是DD'S的常客；大画家徐悲鸿、电影导演史东山、蔡楚生等人，也经常在DD'S聚会。”⁽²⁾知识分子聚集在DD'S里喝咖啡，周围摩登、别致的装潢直观地映入眼帘，首先带来的是视觉上的官能享受，对咖啡馆物质空间的这种审美，很自然地吸引知识分子的追寻。

当然，知识分子对咖啡馆的审美也有着发展和变化。维特根斯坦在论及自然(nature)时提到，自然的物质属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定义变成经由语言和图像指涉的“nature”。段义孚在此基础上延伸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类总是尽其所能建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物理世界，即便这个人造的物理世界充其量只是一片粗放的瘠荒地”⁽¹⁵⁾。按照这个观点，知识分子对咖啡馆产生的依恋，不可能只停留在对物质的审美上：既然大部分自然包括地方和器物，都是人为理解和定义的，那么，对物质的审美，最终会发展到对地方情怀、情愫、氛围的精神性审美。

早在1920年，周瘦鹃《咖啡琐记》中的《生查子》就将咖啡作为一个暗藏情愫的独立意象来进行审美：“电影上银屏，取证欢依事。脉脉唤甜心，省识西来意。积恨不能消，狂饮葡萄醉。更嚼苦加非，绝似相思苦”⁽¹⁶⁾。在周瘦鹃的笔下，咖啡开始有了文学意涵，其语意粘连着愁苦、烦闷、相思等意思。到了1933年，诗人林庚白的《浣溪纱·霞飞路咖啡座上》赋予了咖啡馆的美学意蕴：“雨了残霞分外明，柏油路畔绿盈盈，往来长日汽车声。破睡咖啡无限意，坠香茉莉可怜生，夜归依旧一灯莹。”⁽¹⁷⁾从词中可看到，咖啡馆不仅是一个独立意象，具有传情达意的功能，而且还是一种“客观对应物”，在物体的背后隐含着广泛的象征意义。可见，经由人文作家阐释后的咖啡馆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约定俗成的核心意象。对周瘦鹃和林庚白而言，无论是对这个独立意象进行审美，还是将之用于创作，并构造审美意境，都可看出他们不是对“物”进行简单的聚焦，而是上升为对主体意识的关注。

张若谷对咖啡馆的关注则主要基于三点：第一是咖啡馆的轻松、典雅、闲适、慵懒氛围能让人逃避都市生活的压力，并带给文艺家创作灵感；第二，咖啡馆是现代都市公共领域，能提供场所让人们交流；第三，咖啡店的侍女可以使人们得到审美满足。第一、二点不难理解，正像段义孚说的，审美是“通感”的，细微的触觉、宏大的声响，芬芳的春天都能引发审美的感知和深化。因此，咖啡馆供应不缺的饮食、舒适的座位、动人的音乐，成为了躲避都市压力的作者最好的调节剂；咖啡馆充溢的各种政治观念、文艺思想，甚至男女间情感的抒怀，都使作者心中产生回响与激荡，因而生发出对公共空间的审美。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在张若谷的观念里，咖啡馆的侍女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审美的“想象”。具体而言，当知识分子走进咖啡馆、啜饮咖啡的同时，也在借机欣赏侍女，“所谓咖啡室也者，并不是一走进去便只喝咖啡之谓，谁都知道咖啡店的内容是专雇一班年轻的女招待，所以大多数走进咖啡店的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咖啡”⁽¹⁸⁾。男性知识分子的眼光逡巡、追随着侍女，将欲望投射在她们身上。即便“情人”关系并不存在，也无妨知识分子在想象之中构建二者的亲密关系，并反复细品这种想象。请看温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中的一段：

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频送着你青春的烦愁

你谨慎捧着那玉壶琼浆用着你圆滑的纤手

呀，仅仅一杯淡淡的红色咖啡

我已尝得是泪海酸波酿成的苦酒！⁽¹⁹⁾

在这一段中，作者用个人化视角透视女服务员，使之蒙上了“欲望化”的外衣：你的眼波是“水盈盈醉人的”，频送着“青春的烦愁”；手是“圆滑的”和纤细的，捧着“玉壶琼浆”。侍女在作者的窥视中，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一个男性欲望阐释和挤压后的变异体。而最后咖啡变成了“泪海酸波酿成的苦酒”，也暗示着“我”处在愁苦之中，结合上两句，不妨可以解读成，愁苦之源是“我”与侍女间不平等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我”处在痛苦的“泪海”和嫉妒的“酸波”之中。总的来看这一诗段，作者不仅将侍女审美化了，而且将幻想中的情感关系审美化了。他不仅反复言说，自觉沉溺在无节制的想象中，而且还用修辞(rhetoric)和移情(appropriation)，将想象以“书写”(writing)这种“述行”(performativity)行为表现出来。这一点，恰好印证了张若谷所说的，他来咖啡馆的初衷就是侍女提供了他情感、心理及想象的满足。

总之，咖啡馆满足了知识分子的审美需求。无论是物质性的空间，还是主观上的情愫、想象，他们总借由咖啡馆来完成。段义孚说，“恋地情结”的首要表现方式就是审美，审美使人对地方产生认同感，继而带来归属感和依恋感，甚至“审美并非‘附加之物’，不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之后的生活点缀，而是‘生活’本身”⁽²⁰⁾。这样，知识分子就借对咖啡馆的审美，完成了对咖啡馆“恋地”的第一个面向。

三、家园：由咖啡馆到知识分子的家国意识

段义孚认为，在经历审美的情感体验之后，人会生出“一种更为持久且难以表达的情感反应”⁽¹³⁾，这种情感反应带来归属感，“既好像儿女依恋母亲，又好像夫妻相互依恋，……所以我们将这种依恋感称之为家园感”⁽¹³⁾。知识分子对咖啡馆的依恋，不如说是咖啡馆带给的“家园感”。马克思在分析巴黎人称道的“流浪汉”(la bohème)时，提到密谋家和流浪汉的部分特性相似，“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只有小酒馆——密谋家的见面处——才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²¹⁾。对密谋家而言，小酒馆(或者说咖啡馆)提供了密谋场合，并能保证他们顺利隐匿在人群中而不被发现，这种咖啡馆提供的安全感和亲缘性，很自然地让密谋者的想象延伸到家园的方向去。

上海的咖啡馆在“白色恐怖”时期就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类似的功能。在1929年10月，上海“公啡”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次筹备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因为“公啡”地处公共租界，营业者是犹太人，巡捕房的线人很难查到这里，这就给与会者提供了相对隐蔽、安全的环境，加之咖啡馆空间较大，可以容纳较多的人，因此“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值得一提的是“左联”的产生，它是几个文学群落分化重组的结果。1929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因国民党中央支执委会秘书处的查处而遭到查禁，为了维系社团发展，也为了摆脱势单力孤的局面，多方文学力量决定化解分歧、目标明确地结成左翼作家联盟。同时，知识分子也渴望有一场能凝聚力量的群聚活动，使他们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公啡”的出现，使认同感和归属感实体化了，通过在这个空间中的活动，这种情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夏衍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1929年底，一天很冷的下午，鲁迅先生亲自到公啡咖啡店出席了筹备‘左联’的聚会，跟潘汉年、冯乃超和我交谈得非常融洽。‘左联’的筹备会一般每周一次，需要每隔两三天就碰头。”⁽²²⁾引夏衍的回忆，更证实了“公啡”为原本意见分歧的各派势力达成统一提供了保障。在“公啡”中交往互动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让人想到本雅明所谓的“波西米亚人”。本雅明说波德莱尔身上具备“波西米亚人”的气质，一方面有着狂醉的酒神气质，另一方面也孕育着反抗现存社会的能力。“左联”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也暗藏着“波西米亚人”的气质，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既沉浸在对现代都会文明的想象中，同时彼此联结，分享着对社会的反思力量。他们身上具备的这种特征，成为成员之间互相认同的标志。正如本雅明认为的每个属于波西米亚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

谋者，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²³⁾。这种彼此认同的联结感，使得容纳联结感的空间具备了家园感。另外，空间的相对安全和舒适也加深了成员之间的彼此认同和协助，反过来更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家园想象”。

段义孚在解释“恋地情结”的情感会由“家”到“国”发生流变时说：家在满足人们基本物质及社会力量的需求外，还会满足人的最高审美，也就是政治理想。由此可见，咖啡馆也因此满足了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国家的想象，以及参与国家变革的政治诉求。

首先，咖啡馆多处于租界，属于“文化真空”区域，意识形态的控制、当权政治的压力会相对少些。比如，国民党当局“包打听”就很少去外国人开的咖啡店，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很难触及到此，这就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讨论提供了安全环境。其次，由于咖啡馆是由消费来定义权力关系的，因此平日里知识分子感受到的等级概念、权力关系、被殖民经验也会相对淡些。在咖啡馆中，不管自己的阶级属性和家庭背景如何，只要他们消费一杯咖啡，便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和产品。从这个角度讲，在咖啡馆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至少是平等的，是遵循着现代民主概念的，甚至也是符合他们对中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想象的。最后，在咖啡馆内，人们政治参与的程度较高。作家马国亮曾记录了在一家咖啡店的见闻：“在咖啡馆里无意中听到两位侍者的讲话，她们谈论的是文艺，国民党，政治，什么都谈，她们说完了郭沫若，又说鲁迅，郁达夫，也说汪精卫，蒋介石，女招待的谈话和素质让我很意外。”⁽¹⁸⁾连服务员都对政治保持相当热情，就不用说过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了，他们讨论政事的热情显然更高。事实上，当时的咖啡馆里是讨论并参与现代革命想象的最好场所，鲁迅就在《革命咖啡店》中描绘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咖啡馆的场景，“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⁸⁾虽然，鲁迅在文中对革命知识分子进咖啡馆持嘲讽态度，但是，通过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咖啡馆是知识分子探讨和思考革命的场地。当知识分子陷入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憧憬和想象时，咖啡馆作为公共空间所承担的爱国叙事功能就得以彰显，而该空间就会生出象征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意涵。

可见，由咖啡馆到“家园”，再到“国家”，再到“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想象路径变得明确。这也印证了段义孚对“恋地”另一个面向的勾勒，即爱国主义“可能是现存的最强烈的地方感”，是“恋地情结”的集中体现。

四、小结

本雅明称巴黎是“游荡者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 of the flâneur)，而反观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寓沪知识分子，咖啡馆对他们来说也是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般的存在。他们对咖啡馆呈现出的“恋地情结”，直接将物理性咖啡馆抬升到“虔地”(geopieté)的精神境界。知识分子和咖啡馆之间彼此定义、协商和阐释，并最终共同完成了知识分子对审美以及家国的想象。

参考文献：

[1] 华侨将在沪创办咖啡厂[J]. 工商半月刊, 1933, 5(12): 124.

[2] 海音. 现代文人与老上海的咖啡店[J]. 纵横, 1999, (11): 57—60.

[3] 段义孚. 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M]. 潘成桂, 译.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98: 8.

[4]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M].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6.

[5] 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é: 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1789—

1914)[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3—124.

[6]Laikwanpan. The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afé Culture in Republican Shanghai[J].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06, (1): 7.

[7]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 毛尖,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8, 25, 28, 28.

[8]鲁迅. 三闲集[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00, 101, 100.

[9]郁达夫. 郁达夫全集·文论(上)[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448.

[10]张若谷. 咖啡座谈[M]. 上海: 真美善书店, 1929: 6, 6, 6, 8.

[11]张若谷. 战争·饮食·男女[M]. 上海: 良友图书出版公司, 1933: 146.

[12]陈子善. 夜上海[M]. 北京: 经济13报出版社, 2003: 221, 224.

[13]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and Cliffs[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4: 93—94, 93, 93.

[14]田汉. 田汉全集(第一卷)[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101—102.

[15]段义孚. 逃避主义[M]. 徐文宁,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7.

[16]曾煜. 烟酒茶食趣[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129.

[17]许超. 咖啡馆之歌[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0: 143.

[18]吴红婧. 职场丽人[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7: 111, 110.

[19]温梓川. 咖啡店的侍女[M]. 上海: 世界文艺出版社, 1933: 6—7.

[20]Yi-fu Tuan. Dear Colleague: 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 I[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134.

[21]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332.

[22]余之. 岁月留情[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 103.

[23]沃尔特·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 张旭东, 魏文生,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38.